

# 梁启超社会主义学说的再认识

江苏师范大学 于海英

**摘要：**梁启超是近代历史上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也是向国人介绍西方社会主义学说的先行者。梁启超早期以赞美和称颂的态度向国人介绍社会主义学说，认为社会主义的理想目标与中国传统的“大同世界”有着文化上的契合。流亡日本后，梁启超阅读了大量有关社会主义理论的著作，对社会主义学说有了进一步的认识。1903年以访美为契机，梁启超虽赞赏和同情社会主义革命，却不赞成在当时的中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也不认为20世纪初期的中国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此后经历两次社会主义论争，他认为首先需要在中国形成一个劳动阶级，然后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造就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为此需要鼓励和扶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以抗衡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晚年的梁启超进一步寻求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的契合，将社会主义内化成中国人的大同理想。这既反映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影响，也折射出20世纪初社会主义学说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激荡。

**关键词：**梁启超 社会主义 中国传统文化

## 序言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诸多文化思潮和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一起涌进中国。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在大力向国人介绍西方文明的同时，也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介绍到中国来，从而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学说的启蒙宣传家。作为中国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可以说社会主义思想是梁启超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一般都绕不开梁启超，因为他是最早讲社会主义的中国人之一，也是最系统、最多样地讲社会主义的中国人之一。对于20世纪初社会主义研究思想重镇的梁启超，被学界给予了持续的关注。

不过，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太多论者对他的社会主义评价都不高<sup>1</sup>，过多地从政治上对他的思想进行评价，给与他“资产阶级改良派”、“庸俗进化论”、“假社会主义”等定性判断。90年代以来，不断有学者对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说作出新的评价，认为梁启超对社会主义学理的把握比同时代很多中国人更为准确，对中国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sup>2</sup>。有些学者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重新评价了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观，认为梁启超的关于社会发展阶段论的学说、过渡论的学说，是有科学根据的，绝不是什么“伪社会主义”<sup>3</sup>。新世纪以来，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领域逐渐凸显出一些新的时代特征。主要体现在注重与同时代人的社会主义思想之横向比较研究、注重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之纵向比较研究，注重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中国化对接研究<sup>4</sup>。可以看出，学界对传统观点与

<sup>1</sup> 田玉松、苏永明认为，梁启超“用大同思想和平均主义来篡改科学社会主义。”(田玉松，苏永明.《试论中国的“大同思想”》，《科社研究》，1983(5):32)。黎永泰认为梁启超“本质上是仇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黎永泰《辛亥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初步传播》，《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1))。

<sup>2</sup> 刘圣宜《论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观》，《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sup>3</sup> 董方奎《梁启超社会主义观再认识》，《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

<sup>4</sup> 主要代表性的研究有李光和、梁启超《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的几点比较》，《湖南城市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2003(1):12-16页。闫伟杰《梁启超与李大同社会主义思想之比较》，《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董四代、王海林《梁启超对传统理想的阐释和对社会主义的解读》，《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郭刚《角力与诘难：梁启超对社会主义的传播》，《长白学刊》，2011(5)。

分析模式的反思步步深入，从而呈现多元化、细致化之特征。

梁启超对于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行的可行性认识、从社会主义与传统文化、社会主义与中国发展相结合的时代命题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睿智思考和深刻洞见。虽然，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始终伴随批判之声，不过正如同日本学者狭间直树所说：“在传统中国在向近代中国过渡的文明转型时期，梁启超发挥了无以伦比的作用<sup>5</sup>”，他的思想近乎涵盖了近代思想变化的每一个重要的方面，可以说这位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的很多精神财富，还有待于再挖掘、再整理、再评价。回顾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历程，就会发现他对社会主义与中国发展、社会主义与传统文化的阐释确有许多精到的见解，值得我们深思<sup>6</sup>。

本文试图探讨梁启超在各个时期对社会主义的阐释和评价，分析梁启超晚年如何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社会主义的思想资源，考察梁启超如何在历史与现实的关照中深入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实现西方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等理论和现实问题，尝试对梁启超社会主义学说进行再认识、再评价。

### 一、启蒙宣传—赞誉社会主义学说

梁启超对社会主义思潮的介绍，可以追溯到维新变法时期。早在戊戌变法之前，梁启超从其师康有为那里接受了《大同书》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及历史进化论。不仅如此，他经常在《时务报》上介绍英国工人罢工、西班牙社会主义者和德国社会党的有关情况。比如在1896年9月29日《时务报》（第6册）译载的《社会党开万国大会》的短讯，报道了1896年第二国际伦敦代表大会提出的一些主张。1897年12月对当年英国伦敦机器制造业工人的罢工斗争做了报导。“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成为介绍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新思想的重要人物。他先后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大力介绍西方文明的同时，对社会主义学说也异常关注。

梁启超在1899年10月25日的《清议报》上发表《论强权》一文，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重新解释康有为的“三世说”<sup>7</sup>，指出了社会更替是不可替代的潮流。他说：“而今日资本家之对于劳动者，男子之对于妇人，其阶级尚未去，资本家与男人之强权，远甚于劳动者和女子<sup>8</sup>”，“故他日尚有不可避免的二事，日资生革命，日女权革命。经此二革命，然后人人皆有强权<sup>9</sup>”。他清楚地看到，由于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对立，资生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之不可避免。

众所周知，由于戊戌变法的失败，梁启超流亡日本。20世纪前后日本思想界对西方社会主义著述的翻译，为梁启超等人接触社会主义思潮提供了便利条件。梁启超阅读了大量有关社会主义理论的著作，并开始进一步地宣传与介绍。1902年10月16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8号上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颌德之学说》一文，称马克思为社会主义的泰斗、鼻祖，并介绍说：“今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马克思)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尼采)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

<sup>5</sup> 狭间直树，《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修订版日文版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1。

<sup>6</sup> 对于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王海林在《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综述》（《平顶山学院学报》、第32卷第3期、2017.6）中对梁氏社会主义思想的先行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从三个阶段，即改革开放以来到1980年代的传统观点与分析模式下的定性研究、1990年代对传统观点与分析模式的批判反思，20世纪以来的研究动向进行了详细的梳理。

<sup>7</sup> 梁景和认为，梁启超的这种解释虽然是一种生吞活剥的运用，但反映出梁启超对社会主义学说异常关注的态度。具体参考梁景和《梁启超与社会主义学说》，《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sup>8</sup> 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354页。

<sup>9</sup> 同上。

弱者少数之强者所压伏。”<sup>10</sup>1902年，梁启超在《干涉与放任》一文里论述了18世纪及19世纪上半期，资本主义采取放任主义“自由竞争”，造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于是近世所谓社会主义者出而代之。社会主义者，其外形若纯主放任，其内质则实主干涉者也。将合人群使如一机器然，有总机以纽结而旋掣之，而于不平等中求平等<sup>11</sup>”。“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20世纪也明矣<sup>12</sup>”。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梁启超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20世纪初中国还没有多少人知道社会主义为何物的时候，梁启超不但已经对西方社会主义学说有所了解，而且对社会主义的理论旨趣有了自己独到的认识和理解。且不论这种认识是否正确，是否与我们今天对社会主义的理解相吻合，他对社会主义学说的介绍，让人们了解了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对社会主义的前景充满了期待。

梁启超对社会主义的态度有了理性认知转变，是在他1903年游历美洲（1903年正月出发，十月返回）期间以及其后，他开始认真探讨和评价社会主义及其能否植根于中国的问题。通过这次新大陆之行，梁启超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特别是自由竞争造成的产业垄断、财富集中、贫富分化以及社会矛盾的积累等问题，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和更多联系实际的思考。梁启超对社会主义有着进一步的认识，并开始认真思考社会主义能否实行于中国的问题。

他在访问期间，与美洲的社会主义者进行了接触。在《新大陆游记》中他这样写道：“余在美洲，社会党员来谒者凡四次<sup>13</sup>”，“吾所见社会主义党员，其热诚苦心，真是另人起敬……盖社会主义者，一种迷信也。天下惟迷信力为最强，社会主义之蔓延于全世界也，亦宜<sup>14</sup>”。需要注意的是，当纽约《社会主义丛报》总撰述哈利逊欲与其联络，在中国组建社会党时，被他婉谢了，对此梁启超结合中国的国情认为“极端之社会主义不仅中国不可行，欧美亦不可行<sup>15</sup>”。他主张，在中国可采用国家社会主义方案，即“以极专制之组织，行极平等之精神<sup>16</sup>”，较为符合中国国情。

之后，1903年11月至12月，他在《新民丛报》第40-43号发表《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的长文，在肯定自由竞争对19世纪人类文明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的同时，指出了托辣斯和社会主义同产生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极度发展。

“虽然，天下事利之兴弊，每相倚伏。自由竞争之过度，其病国病群也，忽又出前贤意计之外。……然其弊，固不徒在资本家而已，即劳力者亦随而殃及。……加以小资本家力不克任，相次倒闭，弱肉强食，兼并盛行。于是生计界之秩序破坏，劳力者往往忽失糊口之路，势亦不得不乞怜于彼之能堪剧争之大资本家。故大资本家从而垄断焉。……此近世贫富两级之人，所以日日冲突，而社会问题所由起也。于斯时也，乃举天下厌倦自由，而复讴歌干涉。故于学理上而产生出所谓社会主义者，于事实上而产生出所谓托拉斯者。社会主义者，自由竞争反动之结果。”<sup>17</sup>

他在看到美国的贫富不均，两极分化的现象之后，颇有感慨地说：“吾观于纽约之贫民窟，而深叹社会主义之万不可以已也！”<sup>18</sup>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病症必须以社会主义的方法加以救治。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梁启超虽然认为社会主义必然蔓延于全世界，但在当时的中国，并不存在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

<sup>10</sup> 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1029页。

<sup>11</sup> 同上，384页。

<sup>12</sup> 同上，384页。

<sup>13</sup> 《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1146页。

<sup>14</sup> 同上。

<sup>15</sup> 同上。

<sup>16</sup> 同上。

<sup>17</sup> 同上，1100页。

<sup>18</sup> 《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1145页。

此后,梁启超相继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多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其中在1904年2月发表的《中国之社会主义》,可以看出梁启超对社会主义学说新的认识。他在这篇文章中介绍说:“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概括其最要主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麦喀士曰:现今之经济社会,实少数人掠夺多数人土地而组成之者也。”<sup>19</sup>他认为社会主义应是土地和资本归国家所有,劳动是价值的源泉。

从以上可以看出,自1899年以来,梁启超在《请议报》、《新民丛报》上介绍宣传马克思及社会主义学说,对社会主义基本上一直是称颂与赞誉有加。对资本主义托拉斯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社会主义产生的原因及必然性等都相继作了介绍和粗略说明,推动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另外需要注意一点的是,梁启超虽然预言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却也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的中国,尚不存在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从这一点来看,梁启超的认识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

## 二、对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两次社会主义论争

20世纪初期,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两次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重要论争<sup>20</sup>。梁启超积极参与其中,并就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中国能否进行社会主义实践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 1、1906年前后的第一次社会主义论争—中国尚未到达实行社会主义的阶段

众所周知,在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大潮中,产生于西方的各种思想纷至踏来,陆续传入中国,“社会主义”即其中之一。在社会主义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日本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中转站”。大量的留日学生在刊物上作翻译、介绍和评论,革命派刊物《民报》和立宪派的《新民丛报》,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以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对中国前途长期进行激烈辩论。争辩议题除了对是以暴力手段自下而上进行革命还是以非暴力手段自上而下改革外,另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新中国”能否实行“社会主义”。

虽然梁启超介绍、推崇过社会主义,但是他却不赞成、甚至反对孙中山等革命派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主张<sup>21</sup>。一,对同盟会中建设“社会国家”的主张,他提出质疑:“即行社会革命,建设社会的国家,则必以国家为一公司,且为独一无二之公司,此公司之性质,则取全国人民之衣食住,乃至所执职业,一切干涉之而负其责任<sup>22</sup>”。他仅凭只言片语就能看到在这种体制下所有权力都为国家所有、个人将无任何权利的巨大危险。二,他认为孙中山提出的土地国有等具体政策并不可行,且并非真正的社会主义。三,他认为最重要的理由是中国与欧美现在发展阶段不同:“欧洲为什么有社会主义?是由工业革命孕育出来,因为工业组织发达得偏畸,愈发达愈生毒害,社会主义家想种种办法矫正他,说得都是对症下药。在没有工业的中国,想要把他们悉数搬来运用,流弊有无,且不必管,却最苦的是搔不着痒处。”<sup>23</sup>

<sup>19</sup> 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3页。

<sup>20</sup> 韩华在《梁启超与两次“社会主义”论争》(《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8卷第1期,2001年1月)中对两次社会主义论争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并且指出在20年代的第二次论争中,梁启超在提出自己的“社会主义”见解时对中国国情的关注,对包括苏俄在内的外来势力对中国利益的可能侵害的防范,以及国人在“走俄国人的路”的政治选择下如何坚持国家民族利益所提出的意见,是有启发价值的。

<sup>21</sup> 在此次论争中,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人士倡导土地国有政策,认为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其核心内容是“平均地权”、“土地国有”,具体实施办法为“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家所共享”(朱执信,《论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民报》第5号。)

<sup>22</sup> 《杂答某报》,《新民丛报》86号(1906年9月3日),18页。

<sup>23</sup> 《欧游心影录—十一社会主义商榷》,《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2984页。

他并非从根本上反对社会主义，而是认为尚未到达实行社会主义的阶段，日后中国工业发达、资本力量强大了，才能实行社会主义。

关于革命派的一切公益事业收归国有，对资本家实行“止富”“散富”的办法，限制其发展，阻止在中国出现托拉斯垄断，达到财富平均的目的等的“节制资本”的政策，梁启超也持反对意见，认为中国应该保护和发展私人资本经济。

梁启超又指出，今日欧美各国以过剩资本“临视全球”，纷纷争夺中国市场，严重威胁中国经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只能奖励资本家“结合资本”，利用西方的文明机器，用我丰富之人力物力资源以求利，“则国富可骤进，十年以往，天下莫御也<sup>24</sup>。”如果对资本家采取抑制政策，以现在“资本之微微不振，星星不团，不能从事于大事业<sup>25</sup>”，怎能与人之外国资本竞争呢？今日“我若无大资本家出现，则将有他国之大资本家入而代之，而彼大资本家既占优势以后，则凡无资本者或有资本而不太者，只能宛转疾死于其脚下，而永无复苏之一日<sup>26</sup>。”因此，“我中国欲解决此危险之问题，惟有奖励资本家，保护资本家，让他们结合起来，发展生产<sup>27</sup>”，“使其事业发达以与外抗”，“从各方面以抵挡外竞之潮流，庶可有济<sup>28</sup>”。

梁启超强调指出，从当前国家利益看，应发展生产以与国际资本经济侵略抗衡，“生产问题解决与否”，关系国家的生死存亡。至于分配问题，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虽是一个“隐祸”，但那是将来的事，“急则治标”，不得不先奖励资本家发展生产，分配问题留待以后去解决。

关于革命派的土地国有政策，梁启超指出，急进派的这套方案，既不科学更不符合中国实际，他说，近世最圆满之社会革命认为，不仅土地应归国有，资本亦归诸国有，而欧美社会分配不均的根本原因是由于“生产机关”（按指生产资料）私有制所决定的<sup>29</sup>。至于地价上涨，也是“资本膨胀之结果”，因此，欲解决社会问题，“当以解决资本问题为第一义，解决土地问题为第二义<sup>30</sup>”。梁启超指出，论者以为“若一旦解决土地问题，则社会问题即全部问题解决者然<sup>31</sup>”，是“未识社会主义之为何物也<sup>32</sup>”。他认为，全部土地实行公有是没有必要的，也是很难管理，很难坚持的。

从以上梁启超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梁启超并不从根本上反对社会主义，而是认为当时中国尚无条件实现社会主义。他对当时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分析，指出当时中国必须奖励资本家、发展生产力，否则永无富强之日这些主张，都是正确的，甚至确有独到卓识之处。

## 2、1920年代社会主义论战—反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

20世纪20年代有关“社会主义”的论战，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理论探讨。在这场争论中，由梁启超任主编的《改造》杂志1921年2月号特辟的“社会主义研究”专栏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一栏中，发表了梁启超、蓝公武、蒋百里、蓝公彦、费觉天、张东荪等人的长文章，辩论的另一方是一批热血沸腾的青年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如陈独秀、李达、陈望道、蔡和森等。1921年3月梁启超写的《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一文，集中表明了他对社会主义运动极端矛盾的态度。用他自己的话说：“非对于主义本身之何去何从尚有所疑问也。正以确信此主义必须进行，而在进行之途中，必经过

<sup>24</sup> 《杂答某报》，《新民丛报》86号（1906年9月3日），18页。

<sup>25</sup> 同上。

<sup>26</sup> 同上。

<sup>27</sup> 同上。

<sup>28</sup> 同上。

<sup>29</sup> 《杂答某报》，《新民丛报》86号（1906年9月3日），21页。

<sup>30</sup> 同上，22页。

<sup>31</sup> 同上，21页。

<sup>32</sup> 同上，47页。

一种事实—其事实之性质一方面为本主义之敌，一方面又为本主义之友。吾辈应付此种事实之态度友视耶？敌视耶？两方面皆有极大的利害与之相缘<sup>33</sup>”。所以始终未能拿定主意。“吾每积思此事，脑为之炎，今勉强截断众流，稍有祈响，然终未敢自信也<sup>34</sup>”。

论辩过程中凸显了三个问题：一是中国应否实行社会主义；二是中国是否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三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是怎样的。对于第一个“中国应否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梁启超对于社会主义并没有完全持否定态度，也没有完全站到它的对立面去。可以说辩论中的梁启超是以资产阶级同时为敌、为友的渐进的“社会主义者”<sup>35</sup>。对于第二、第三个问题他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了他反对在中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的理由。

**第一、中国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社会主义是用来救济社会经济弊病的，西方之所以有社会主义，就是因为工业社会的弊病导致的。而中国没有这个忧虑，因为中国根本就不存在工业社会这一形态。梁启超说：“在没有工业的中国，想要把它悉数搬来应用，流弊有无，且不必管，却最苦的是搔不着痒处<sup>36</sup>”。中国并不具有工业社会这一社会主义产生的经济条件，因而，在无工业的中国社会中，倡导社会主义也就自然无用了。

**第二、中国缺乏实行社会主义的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梁启超认为，实行社会主义要靠政府民主化，“当先以政治上有完善可信任之组织为前提<sup>37</sup>”，这是最重要的政治条件，而当时的中国缺乏政治民主，在这种状态下实行社会主义，必然导致腐败，“为蠹国之徒资利用<sup>38</sup>”，从而破坏社会经济发展。梁启超认为当时的中国也缺乏实行社会主义的社会条件，即中国人的道德水平还未达到一定高度。“经济之最大动机，实起于人类之利己心<sup>39</sup>”，要“使人人为了正义而劳动，或仅为满足直接消费之欲望而劳动<sup>40</sup>”，必然“消减其勤勉赴功之心<sup>41</sup>”，也无助于社会经济发展。因此梁启超认为，实行社会主义不能急于求成，要首先创造政治条件与社会条件。

**第三、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来看，中国不能走社会主义道路。**梁启超提出，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劳资的对立，但在中国既没有资本家，也没有劳动者。梁启超说：“吾以为社会主义所以不能实现于今日之中国者，其总原因在于无劳动阶级<sup>42</sup>”。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了中国不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欧美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能使多数劳动者地位得以改善。当前中国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能使多数人民得以变为劳动者。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不是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对抗，而是有业与无业之间的矛盾。“故在欧美倡导此主义，其旗帜极简单明了，亦曰无产阶级与有产阶级抗争而已，中国则有业无业乃第一问题，而有产无产，转成第二问题。……故中国之社会运动，当以使多数人取得劳动者地位为第一义。地位取得，然后改善乃有所言<sup>43</sup>”。

**第四、中国社会主义运动更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国社会发展的未来在于民族资产阶级，需要大力发展资本主义。**从中国社会面临的民族问题出发，梁启超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状况作了分析。“在我国内，外国资本家早已高踞上游，制了我们的死命……全国人都属于被压制的阶级，那压制的阶级是谁，

<sup>33</sup> 《饮冰室文集》之三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1页。

<sup>34</sup> 同上。

<sup>35</sup> 应学犁《梁启超在二十年代初社会主义问题争论中的角色》，《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

<sup>36</sup> 《欧游心影录—十一社会主义商榷》，《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2984页。

<sup>37</sup> 《饮冰室文集》之三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4页。

<sup>38</sup> 同上。

<sup>39</sup> 《饮冰室文集》之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22-23页。

<sup>40</sup> 同上。

<sup>41</sup> 同上。

<sup>42</sup> 《饮冰室文集》之三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6页。

<sup>43</sup> 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748页。

却是外国资本家。我国四万万同胞，受外国资本之压迫而失业者，什九已相索于枯鱼之肆也<sup>44</sup>”。正因为如此梁启超指出，民族资产阶级不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敌人，对之不能采用敌对的态度；相反，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社会未来的希望所在。梁启超主张对资产阶级进行矫正和疏泄态度，以正确态度对待那些为本国作出努力的资本家，承认其对社会的贡献。“通过政府的作用，调和劳动者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另外，在政治成熟的时候，在人民的监督下，逐渐发展国营和地方公益事业，发展各种协社<sup>45</sup>”。梁启超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提出了三点发展规划：一是对于资本家采取矫正态度，现在劳资协调的状况下，徐图健实的发展。二是极力提倡协社，使全国生产之中枢，渐移归公众之手。三是谋劳动团体之产生发育强立，以为对全世界资本阶级最后决胜之准备。通过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养成本国的劳动阶级，为社会发展提供阶级需要。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梁启超看到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并努力证明通过发展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培养出劳动阶级，试图为中国社会发展提出一条除社会主义之外的可能道路。

梁启超对社会主义的理想是认同的，不过在当时“对社会主义可行性的认识问题”的认知上，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并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在手段和方法上认为，中国首先必须发展资本主义，发展生产，以此来作为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应当说，这种认识是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的。

### 三、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社会主义的对接口

梁启超是受过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浓厚熏陶过的，当社会主义思想及运动在西方社会盛行之际，梁自然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和历史土壤中寻找解释。早在维新运动时期，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曾作《大同书》，以《春秋》“三世”之说阐释《礼记·礼运》中的大同思想，认为《礼运》中所谓“小康”即是《春秋》中的“升平世”，所谓“大同”即是《春秋》中的“太平世”，而“太平世”或者“大同”正是孔子理想的社会制度<sup>46</sup>。梁启超从康有为那里接受了《大同书》的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并且视《大同书》的理论为社会主义理论。梁启超当年接受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可以说是他日后赞同西方社会主义学说的思想基础<sup>47</sup>。

另外，1901年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中说：“先生之哲学，社会主义派哲学也。泰西社会主义，原于希腊之柏拉图，有共产之论。及十八世纪，桑士蒙康德之徒大倡之，其组织渐完备，隐然为政治上潜势力。先生未尝读诸氏之书，而其理想与之暗合者甚多，其论据之本，在《戴记·礼运篇》孔子告子游之语。”<sup>48</sup>梁启超以社会主义为题发挥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努力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社会主义的根据，而且强调“社会主义这种精神，不是外来，原是我所固有，孔子讲的‘均无贫和无寡’，孟子讲的‘恒产恒心’就是这主义的最精要的论据”<sup>49</sup>；“墨子之攻术，非国家主义，而世界主义社会主义也”<sup>50</sup>；“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sup>51</sup>。梁启超把西方的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的文化相联系，从而更好地推动的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

梁启超还从先秦思想各学派中寻求社会主义思想的来源。他认为：“我国对于生计问题之见地，自先秦诸大哲，其理想皆近于今世所谓‘社会主义’<sup>52</sup>”。梁启超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社会主义思想与中

<sup>44</sup> 同上，752页。

<sup>45</sup> 同上，756页。

<sup>46</sup> 《南康海先生传》，《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489页。

<sup>47</sup> 梁景和，《梁启超与社会主义学说》，《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sup>48</sup> 《南康海先生传》，《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489页。

<sup>49</sup> 《欧游心影录-十一社会主义商榷》，《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2984页。

<sup>50</sup>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7卷），中华书局，1989年，41页。

<sup>51</sup>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9年，102页。

<sup>52</sup> 《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全集》第5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108页。

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契合点，目的在于说明，提倡社会主义，重在采择其精神，因为“这种精神，不是外来，原是我所固有<sup>53</sup>”。需要注意一点的是梁启超对社会主义进行了层次上的划分。在梁启超看来，社会主义是世界性的大问题，但又分为精神、方法和政策。从精神上讲他说：“讲到国民生计，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国内提倡新思想的人，渐渐的注意研究他，也是很好的现象。但我的意见，提倡主义精神和方法不可并为一谈<sup>54</sup>”。这种精神是中国所固有的，所以要发扬光大。从方法上讲，“什么叫做社会主义呢？社会主义，是将现在经济组织不公平之点，根本改造。改造方法，虽然种种不同，或主共产，或主集产，或主生产事业全部由能生产的人管理，或主参加一部分，或用极端急进手段，或用平和渐进手段。要之对于现在的经济组织，认为不合人道，要重新组织一番，这就是社会主义<sup>55</sup>”，从政策上讲，“社会政策，是在现在的经济组织之下，将那不公平之处，力图救济<sup>56</sup>”。在梁启超看来，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社会主义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又区分和比较了社会政策和方法，主张一边发展资本主义，一边采取社会主义政策，纠正资本主义导致的社会不公平<sup>57</sup>。

梁启超以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把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联系起来，不断从中国的传统典籍、思想观念和制度中寻找对社会主义学说进行中国化阐释的思想资源。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与西方各国有很大不同，但梁启超认为从精神上讲中国古代大同思想与社会主义是一致的，他说：“欧洲所谓社会主义者，其唱导在近百余年耳。我国则孔墨孟荀商韩以至许行白圭之徒，其所列论，殆无一不带社会主义色彩<sup>58</sup>”他不仅认为儒家大同思想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视墨家兼爱尚同精神为社会主义，并以此为根据研究社会主义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意义问题。他的这种解释，一方面有利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社会主义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研究社会主义与中国社会变革和未来发展的关系问题<sup>59</sup>。

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后，欧洲对社会主义趋之若鹜，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传到中国，梁启超也像当时中国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开始进一步研究社会主义。1918年12月梁启超去欧洲之前，对社会主义已有一定了解。到了欧洲以后，更是关注这个问题，因而这一时期梁启超对社会主义有了更深入的研究。欧游归来，其所著的《欧游心影录》中有相当篇幅是用来讨论社会主义问题的。值得注意的是，直到梁启超的晚年，梁启超仍坚持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所固有的观点。在《欧游心影录节录》“社会主义商榷”中，在高度评价“讲到国民生计上，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sup>60</sup>”，肯定“国内提倡新思潮的人渐渐的注意研究他，也是很好的现象”后，梁氏继续强调“这种(社会主义)精神不是外来，原是我所固有。孔子讲的‘均无贫和无寡’孟子讲的‘恒产恒心’，就是这主义最精要的论据<sup>61</sup>”他还特别加上一句自我辩白：“我并没有丝毫附会<sup>62</sup>”

1918年12月，梁启超与蒋百里、丁文江、张君勱等7人旅游英、法、德、意等欧洲列国，1920年1月离欧，3月返回上海。梁氏一行访欧期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西方现代文明的种种弊端一并充分暴露，一批西方人，尤其是西方的人文学者对西方文明持批判态度有的甚至对西方文明陷入绝望，并把希冀的目光投向东方。梁启超回国后发表的《欧游心影录》则是在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弊端有所洞察后，再反观东方，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西方文明有重要的启示价值。他认为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科学

<sup>53</sup> 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29页。

<sup>54</sup> 《欧游心影录-十一社会主义商榷》，《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2984页。

<sup>55</sup> 《国际劳工公约评论》，《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3043页。

<sup>56</sup> 同上。

<sup>57</sup> 王海林，《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再评价》，《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sup>58</sup> 《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3605页。

<sup>59</sup> 董四代、郭萌《梁启超对社会主义的阐释与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武夷学院学报，第31卷第6期，2012年12月。

<sup>60</sup> 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29页。

<sup>61</sup> 《欧游心影录-十一社会主义商榷》，《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2984页。

<sup>62</sup> 同上。



技术的进步，人类的物质生活日益丰富，且日益挤压人类精神生活的空间，西方近代的理论，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学说，“皆奖励人心以专从物质界讨生活<sup>63</sup>”，南辕北辙，从而导致西方文明弊病百出，满目疮痍。故而西方学者纷纷转向东方文明、特别是中国文化中寻求救助之方，以解救日渐没落的欧洲。梁启超也指出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可能出现的问题以警醒中国人：“如何而能使吾中国人免蹈近百余年来欧美生计组织之覆辙，不至以物质生活问题之纠纷，妨害精神生活之向上。”<sup>64</sup>

1922年梁启超著《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在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研究中，隐含着中西文明对话的巨大话题，以东方文明解救西方现代文明之弊，固然是其题中之义。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一命题转换一下，便会发现梁启超始终认为中国古代一直有着社会主义的精神。他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一文中写道：“欧洲所谓社会主义者，其唱导在近百余年间耳，中国则孔、墨、孟、荀、商、韩以至许行、白圭之徒，其所论列，殆无一不带有社会主义色彩。<sup>65</sup>”而且，“我国自春秋战国以还，学术勃兴，而所谓‘百家言’者，盖罔不归宿于政治。其政治思想有大特色三，曰世界主义，曰平民主义或民本主义，曰社会主义。此三种主义之内容，与现代欧美人所倡导者为同为异，孰优孰劣，此属别问题。要之，此三种主义，虽不敢谓为我国人所单独发明，然而最少亦必为率先发明者之一<sup>66</sup>”。晚年的梁启超逐渐认识到，中国的政治建设必须根植于传统的土壤之上，是否实行社会主义与否“要从本社会遗传共业上为自然的浚发与合理的箴砭洗练”<sup>67</sup>。因此，在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进程中，如何根植于传统的土壤，洗练针砭中西文明，创造出一种适合中国的新的政治文明，是梁启超终生努力的目标，也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个巨大话题。

梁启超作为最早接触和了解西方社会主义学说的中国人之一，对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契合以及社会主义是否适用于中国等问题进行的诠释与思考，从当代中国发展面临的各种现实矛盾和问题来看，他的判断有着惊人的洞察力和前瞻。通过这种方式，梁启超不但找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社会主义思想的契合点，而且开启了以社会主义思想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的先河<sup>68</sup>。

## 结语

梁启超是近代历史上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学术界的泰斗，是20世纪初期向国人介绍西方社会主义学说的先行者。梁启超早期以赞美和称颂的态度向国人介绍社会主义学说，认为社会主义的理想目标与中国传统的“大同世界”有着文化契合。此时梁启超对社会主义学说的认识还不系统，也不深刻。虽然梁启超用传统经典阐释社会主义学说多有比附之嫌，然而却有利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流亡日本后，梁启超阅读了大量有关社会主义理论的著作，对社会主义学说有了进一步的认识。1903年以访美为契机梁启超虽赞赏和同情社会主义革命，他不赞成在当时的中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也不认为20世纪初期的中国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他认为首先需要在中国形成一个劳动阶级，然后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造就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为此需要鼓励和扶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以抗衡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晚年的梁启超进一步寻求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的契合，认为制度变革“不植基于国民意识之上，譬犹掇邻圃之繁花，施吾家之老干，其不能荣育宜也。<sup>69</sup>”将社会主义内化成中国人的

<sup>63</sup> 《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3694页。

<sup>64</sup> 同上。

<sup>65</sup> 同上，3605页。

<sup>66</sup> 同上，3604页。

<sup>67</sup> 同上，3606页。

<sup>68</sup> 孙建昌、李素英《论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观》，《山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146页。

<sup>69</sup> 《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3606页。

大同理想。这既反映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影响，也折射出20世纪初西方社会主义学说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激荡。